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鲁曼社会系统 理论与现代性

(第2版)

高宣扬 著

本书第2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研究”（批准号14ZDB018）的部分成果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鲁曼社会系统 理论与现代性

（第2版）

高宣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高宣扬著.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4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ISBN 978-7-300-18774-7

I. ①鲁… II. ①高… III. ①社会学-研究-德国-现代 IV. ①C91-095.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659 号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 (第 2 版)

高宣扬 著

Luman Shehuixitong Lilun yu Xiandaix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规 格	170 mm × 240 mm 16 开本		2016 年 3 月第 2 版
印 张	19.2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6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代自序：在哲学与非哲学中迂回

我的哲学生涯，就是我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浪迹天涯的生活历练以及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时时推进我的思想情感，穿越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通过在各种文本中的循环迂回反思，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从十五岁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国内外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命运，我始终同哲学打交道，并在同哲学的交往中，不断地改变对哲学的看法，而我的命运本身，也渗透着哲学的神秘力量，使我品尝了生命过程的酸甜苦辣滋味。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照和澄明，见证了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和怀念。当尼采在晚年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时，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情，由衷地称叔本华为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参见尼采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1873—1876），从而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时时伴随我思想脉动的内在力量，来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遭遇。而在我所遭遇的关键人物当中，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就是五个人：我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他们分别地出现在我生命转折的不同时期，使我在亲身经历的不同生活时空中，从出生入死、苦乐交替的动荡不定生活和深沉反思中，懂得了哲学与生存之间的血肉交融关系，体会到哲学的开放性及其在人生历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流连忘返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初，在阴历虎年岁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我出生在一个漂泊海外多年的华侨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靠他们所获得的暨南大学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凭，四十多年如一日，始终任教于华侨教育界。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永远都以任教的学校为家。如同萨特从小就在其外祖父的带领下看书一样，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身为华侨学校教师的父母的教导下，培养出以看书写字为乐的生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不但给了我肉体生命，尤其还赋予我精神生命和哲学灵魂。

打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同她批改学生作业，殷切期盼她在夜深人静、改完学生作业之后，字字句句带我习读动人的神话。妈妈耐心地指导我看书，并在阅读中，启发我敞开想象的大门，训练我最初的超越现实的能力，还教我学会查《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和看地图。爸爸则几乎天天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向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并严厉地要求我熟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试图让我从人类经验中，体验人生的艺术。从此，查字典和看地图，成为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游戏活动；学校图书馆和挂在教室墙上的各种大地图，也成为我的玩伴和游戏场所。每当我在字典里亲自发现一个新词汇，认出一个新国家、河流、山脉或港口，就喜出望外地向妈妈报告，于是，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由此，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飨宴的珍贵机遇。

七岁那年，妈妈教我从头到尾系统地看书的最初读本，是当时学校图书馆藏的《苦儿努力记》和《岳传》。前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Hector Malot）所写的 *Sans famille*（原文直译为《无家可归》）的中文译本，为中国作家夏丏尊所译；后一本是属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历史普及丛书。这两本书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魔力，对我的思想和生命成长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我的心灵成长过程，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一生命运的镜子和缩影：我本人所经受的大跨度时空变

迁，大起大落，以及一切令人刻骨铭心的生活煎熬和情感震荡，都活生生地重演了两本书的情节。

当我第一次阅读《苦儿努力记》时，首先使我佩服的，是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竟把原来法文的著作流畅地译成中文！我当时就暗自立志，长大后要像他那样，成为懂得多国语言的作家。事隔三十一年之后，1978年，我移居法国巴黎，竟然在巴黎地铁网上，找到了《苦儿努力记》所提到过的巴黎东南郊城镇 Boissy-Saint Léger。我兴奋地多次访问这座城镇，东张西望试图发现小说主人公雷米（Rémy）随同抚养他的民间杂艺表演老艺人的历史踪迹。以后，我又特地两次到《苦儿努力记》所讲述的法国东南弗朗斯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度假，来往于瑞士和法国边界，抱着缅怀、同情和鉴赏的态度，反复沉思流浪儿雷米当时徒步穿越这一地区山川大地的哲学意义，因为我已经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哲学炼狱与人生沧桑沉浮的过程中，体会到我同雷米一样，不由自主地在不同舞台上，演出了类似的充满戏剧性的游牧生活遭遇。同样地，《岳传》给予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不可磨灭的情结之一，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我身在海外何处，也不管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这一情结如同一股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我的思路和情绪的起伏；而岳飞晚年遭受陷害的悲剧，也在“文化大革命”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地“批斗”中，活灵活现地重演着：人们当时竟然对我的华侨爱国之心，抱着怀疑、鄙视，甚至嘲弄否弃的态度！

这一切，就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起点。随后，即使哲学把我带到古希腊、古罗马或古典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法国，都脱离不开少年时期母爱和母文化对我的熏陶；同样也无法抚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所刻烙留下的沉痛创伤，它们时时申饬着我的心灵，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并以顽强的精神，渗透到我所吸收的一切文化当中；反过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越是起伏不平，面临的新鲜文化越是层出不穷，我对生活和哲学的“流浪”、“迂回”、“永恒轮回”的性质，就感受得越深。

1952年，十三岁，是《岳传》所传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决定离开

在印尼的温暖家庭，只身归国求学，并选择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作为我在祖国的落脚点。从热带零上二十多度的印尼到北温带寒冬零下二十度，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不但没有使我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悔恨，反而更加深了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决心。

正是在东北，我在母文化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时又大量地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使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青春期，被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五岁那年，高中一年级，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我的处女哲学读物。

毛泽东教给了我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的终身第一志愿。为此，我要永远感恩和怀念毛泽东。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和康德先后激发和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确切地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首先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解读马克思和康德。接着，马克思的哲学让我进一步学会将人的激情与哲学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辩证法的精神与生活的逻辑扭结合一，以大无畏的探索实践，寻求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真理。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我的导师郑昕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让我领悟到“人作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严；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理性及其界限，启发我要善于在生活中，依据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但又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1966年春天，我手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文凭，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工作，但迎接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对毛泽东、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理解，才真正地受到了检验，我也受到了终生

难忘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像火焰翻滚的熔炉，熔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我的个人命运同无情的权力争斗、亿万人的生离死别铰链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但又最丰富、最珍贵、独一无二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身在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的北大哲学系，但我始终得不到机会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化大革命”对我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我反倒获得了机会，让我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反复穿越毛泽东和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思想、语言论述、历史、生活逻辑、生命情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神秘交错结构；同时，人类社会也以最典型的形态，暴露出它的正反两面性；历史的悲剧与喜剧，特别是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那些最丑陋、最肮脏、最虚伪的正式情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赤裸裸地同时生动地上演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历史浩劫，又是人性和兽性联合同场演出的历史狂欢节。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时时牵动着我的哲学思路。后来，即使到巴黎或台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经常从无意识的底层冒现出来，影响着我对世界和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我先后在香港地区、法国和台湾地区居住，也多次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足迹遍布欧、亚、美。同我的生活经历一样，我的哲学研究领域，涉及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我的学术领域的转移，同以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一样，一方面并非单向性和一次性的，而是循环的和重复的；另一方面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它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我的哲学研究本身，由于我对

哲学持有开放的态度，促使我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其次，思考本身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其中来自生命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量，超出我的主体意识，推动我不断越出学科的界限，不仅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文本中间穿梭，也深入到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试图在多向和多维的时空中，寻求新的自由可能性；最后，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和不断转向过程，也引导我不断突破原有的范围。

在法国的二十五年，当代法国哲学家不断逾越传统哲学的边界，并与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式的创新过程，使我心花怒放，带领我跨入无限自由的哲学新天地。

从1978年起，历经颠沛漂泊而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终于领会到尼采为什么要以“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激情，宣告人的生存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所刻印的伤痕，早已见证了尼采的论断。其实，要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仅要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且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权力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充实、自我扩大的逾越欲望，是彻底摆脱自然状态的、真正的人的永不枯竭的生活动力，又是具有最高尊严的人，历练人生的纵横驰骋，泰然自若地出生入死，精通生死艺术，确信自己将“同这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崇高情操。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哲学家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真正地将自身的思想同生活情感、同人类历史、同他人的各种文本连成一片。

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是可以脱离实际的生命情感的。思维

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孤立的主体意识之中；没有生活激情的思想是死板的，不同他人的文本进行来回交往的思索是贫乏的。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如同生活本身，理性、意识、情感、意志、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复杂因素，甚至包含一些无法说出、难于确定、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永远都混合在一起，而且也紧密地同思考者本身的生命律动及其生活世界相交错。哲学只有在同非哲学的比较、交往和对话中才能存在。哲学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使它本身永无止境地进行自我超越和超越一切。

然而，超越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永不平静，更不归结为胡作非为。超越过程，包含了生活中必要的平静和节制，集中了生活和思维的艺术性。在我最近研究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我再次感受到超越过程的审美意义。

在出国流浪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通过穿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文本的迂回，在陆续总结生活经验和哲学思考心得的过程中，撰写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论》、《解释学简论》、《德国哲学的发展》、《罗素传》、《毕加索传》、《萨特传》、《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社会理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后现代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等二十五本专著。由五百余万字所交织而成的文本，并不全是我本人所要说出的话语，因为生活和哲学思考所经受的体验和其中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如实地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以折射镜的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律动和情感。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书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它们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方面，体现了生活和哲学生涯的流浪特质。

今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高宣扬谨识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第2版前言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始终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延伸，有时充满阳光，有时陷入危机，使理论本身运载着人间希望和创造精神，一等地经历重生和创新的过程。鲁曼本人的思想创造历程，也恰好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理论的重建演变过程。在谈到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建过程及其核心问题时，鲁曼指出：“在最近几年，我环绕两个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的理论计划而工作。一方面我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系统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这个理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概念为起点，而且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自我参照关系理论（Theory of Self-Referential Relations）以及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中得到启发。在这里，‘复杂性’（Complexity）和‘意义’（Meaning）概念是进行功能分析的关键。另一方面，我集中研究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当代社会，我们再也不能把它描述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某种‘科技贵族专制系统’（a scientific-technocratic system）。我们必须改之以一种指涉社会分化的社会定义。不同于一切早先社会的当代社会，它是一种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要求对于它的每一个单一功能次系统进行详尽的研究。再也不能从一种单一的主导观点去把握社会。反之，要详细理解它的运作动力，必须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经更加相对地自律化了，而且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

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环境。”^①

针对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形成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不但是从理论层面，而且尤其是从我国近代社会建设层面，我们都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其实际运作过程，灵活地应用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对其中的法律系统、教育系统、政府权力系统、艺术系统和宗教系统等进行专门化研究。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也已经逐步引进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但从理论以及它同现代化实际问题的结合来看，仍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需要学术界通过研究、调查、分析和争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动起来。

借再版的机会，对原版中的旧资料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杨宗元主任和符爱霞女士及其编辑团队，她们为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真诚的帮助。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6 年元旦

^①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xii.

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已于1998年与世长辞。当代又一位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离开了我们。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界的一颗巨星，他以其辉煌作品的灿烂光芒，照耀着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从60年代起，他便不停顿地，甚至可以说极其执著地以其独特风格撰写大量著作，建构出当代社会理论史上一个最浩瀚、最深刻而又最丰富的**社会系统理论**，为研究和了解我们自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和“另类的”理论典范。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理论遗产将永世长存。

我本人有幸在1980年同鲁曼见面。他以非常谦虚的态度询问我对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的《论方法》（*La méthode*）的看法。当时，莫林的《论方法》第二卷刚刚出版，强调了当代生命科学的革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莫林在他1977年出版的《论方法》第一卷中，就已经提出“不确定性”的重要概念，**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由这种极不确定的混沌系统所产生的世界复杂性，要求人们建构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组织”概念。所以，在《论方法》第二卷中，莫林进一步综合了极端复杂的生命活动与极端复杂的周遭世界之间的整合、选择、适应、自我组织以及互动的关系。鲁曼对莫林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肯定，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思想家的睿智风范。

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实际上就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理论产物。鲁曼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地方，主要是它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区分化是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的话，那么，当代社会

的区分化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专业化和自律化。正如鲁曼自己所说：“在最近几年，我环绕两个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的理论计划而工作。一方面我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系统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这个理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概念为起点，而且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自我参照关系理论（Theory of Self-Referential Relations）以及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中得到启发。在这里，‘复杂性’（Complexity）和‘意义’（Meaning）概念是进行功能分析的关键。另一方面，我集中研究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当代社会，我们再也不能把它描述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某种‘科技贵族专制系统’（a scientific-technocratic system）。我们必须改之以一种指涉社会分化的社会定义。不同于一切早先社会的当代社会，它是一种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要求对于它的每一个单一功能次系统进行详尽的研究。再也不能从一种单一的主导观点去把握社会。反之，要详细理解它的运作动力，必须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经更加相对地自律化了，而且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环境。”（Luhmann, N. 1982: xii）由此可见，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称为一种现代性理论。正如我们在本书各章节将要进一步分析的那样，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特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当代社会不断区分化的机制及其各种可能趋势，指出当代社会分化的特征及其所引起的一切复杂后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社会系统理论所集中分析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社会系统的特征。

如同其他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样，他在生前也遭遇到可悲命运。他的作品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未能被多数人正确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理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许多人未能深入其中而徘徊在它的外围，也使他的理论甚至在他在世时便已被冷落或被神秘化。有些社会学家，

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李兹尔（George Ritzer, 1940—），在其洋洋巨著《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中，竟然避而不谈鲁曼社会系统理论。（Ritzer, G. 1992）乔治·李兹尔对于“社会学系统理论”（soci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只不过是按照巴克利（Buckley, W. 1967）、里连费尔特（Lilienfeld, R. 1978）和巴尔（Ball, R. A. 1978）等人的标准去谈论和评价。在乔治·李兹尔看来，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算不上“社会学理论”。其实，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高度抽象化的反思性精神产品。如果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至多也不过要求我们多加思索和反复细嚼慢咽罢了。

20 世纪末各种繁杂而多元的思潮及其文化产品，以越来越短的高频率和越来越紧迫的周期而层出不穷，不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人的思想惰性。在这种情况下，像鲁曼社会系统理论那样的深刻理论，往往遭受冷遇也就不奇怪了。

“系统”本来并不神秘，也并不是深不可测。一方面正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社会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模式，决定了系统的普遍性。先撇开鲁曼艰深的系统理论不说，单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现实的世界中，人们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常用“系统”概念，并以“系统”概念作为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或手段。就是这样，“系统”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手段或工具。也就是这样，“系统”随着人的生活及其活动而普遍出现。因此，“系统”无所不在。“系统”不但到处存在，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系统”之中。“系统”的概念是人类从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认识到和体会到的。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人就会从实际生活中学会使用“系统”概念；人类的实际生活和活动，特别是科学家的各种科学实验以及由实验中所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又进一步使“系统”概念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或其他理论家所提出的“系统”概念，正是建立在人类实际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在鲁曼看来，人类社会的生命是同它的系统性分不开的；社会始

终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Gesellschaft als soziales System）。（Luhmann, 1998: 16-17）不但可以将社会、自然和我们的行动看做一个一个的系统，而且，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如果说生命本身就是系统的话，那么，反过来，任何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同样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因为任何系统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单位，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原因和基础，也都是靠其自身内在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维持其存在的根基。我们不但身处于系统的环抱之中，而且还生活于系统之中。系统之中有系统，系统之外也有系统。同时，每个系统既是系统本身，又是一个独立于其自身之外而运作的其他系统；因为对于自身而言，每个系统固然就是系统本身，但对其他系统而言又是与之无关的独立的统一生命体。对于所有的系统而言，作为一种统一体，每个系统各内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各个系统构成独具特色的生命体。

鲁曼所要强调的，是每个系统的高度自律性、独立性及其不可化约性。每个系统，在鲁曼看来，都有其自身的独立生命。这是由体系或系统的自律性所决定的。在这里，鲁曼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当代生化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系统的生命力及其独特性，决定于它的功能的自律运作。对于鲁曼来说，每个系统的自律性都是靠其独特功能来维持的。系统的自律性使它永远不会受到其系统本身之外的各种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靠其内在各因素间的特有关系来决定。这一点是掌握各系统运作特有逻辑的关键。这也就是说，基于各系统内在因素特有关系而运作的系统，虽然要充分考量它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归根结底，系统只是将其环境的影响当成外在因素，当成其自身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环境变化的次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并不被环境及其变化所决定。换句话说，虽然环境对于系统来说是重要的，但环境的任何变化，只有通过系统自身内在因素相互之间的自我调整或协调，才能对系统发生有效影响。就此而言，系统同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一点也不遵循传统逻辑所规定的那种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